

柳田謙十郎與臺灣的邂逅
——「知與行」、「哲學與對話」——
Kenjuro Yanagida and Taiwan:
A Discussion of Knowing and Acting and
His Concept of Dialogue[§]

橫山泰三

Taizo YOKOYAMA*

關鍵詞：柳田謙十郎、臺灣、西田幾多郎、哲學、對話

Keywords: Kenjuro Yanagida, Taiwan, Kitaro Nishida, Philosophy, Dialogue

§ 本文是中研院 2017 年整合型研究計畫「日治臺灣哲學與實存運動」（計畫編號：AS-106-TP-C02-）子計畫「日本哲學在日治臺灣哲學的影響作用史」的部分成果。

* 京都大學大學院綜合生存學館博士

Ph. D, Graduat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grated Studies in Human Survivability, Kyoto University

摘要

柳田謙十郎（1893-1983）曾經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教授倫理學，在臺灣期間長達十二年（1929-1941），是一位目前未被充分研究的日本哲學家。本文參考其在臺灣期間的著作，考察了柳田哲學所具有的獨特性。柳田赴任臺灣後，開始接觸西田哲學，並非常關注該哲學的方法論。柳田透過對西田哲學的獨特解讀開始對社會科學的思考方式進行批判，因為此方式不僅存在於當時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之中，在資本主義逐漸發展的背景下，也深深地滲透在當時的大眾之中，導致了貧困等社會問題。

柳田在赴臺期間，接觸了西田幾多郎的論文〈經驗科學〉（1939）。戰後柳田以其獨特的哲學思想對西田哲學進行了批判式的發展。柳田發表了論文〈知與行〉（1936），針對「知」（哲學）的實踐面，指出「行」（實踐）所具有的「歷史操作」以及「實驗」意義，並提出「對話」的理論這一獨特的構想。本文一方面檢視了以上柳田的哲學思索過程，一方面探討了柳田是如何在西田哲學的影響下，展開其獨特的哲學思想。

Abstract

This paper spotlights Kenjuro-Yanagida(1893-1983), an Japanese philosopher whom has not been fully studied by researchers previously. By analyzing the works his produced during his 12 years (1929-1941) of stay in the former colonial Taiwan,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originality in his philosophy.

Upon his arrival in Taiwan, Yanagida began studying the philosophy of Nishida Kitaro and was intrigued by its methodology. At that time, objectification did not only prevail among social scientists, but also among civil societies where rapid modernization and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were widely witnessed. With his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Nishida's, Yanagida began to criticize the thinking patterns of social scientists, believing that it wa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to poverty and public suffering.

Yanagida read Nishida's thesis, "Empirical Science"(1939), and later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he developed his original idea out of his criticism to Nishida. He found that "knowing" (*chi*) has a sense of "philosophy" in its deepest meaning as practice, whilst "acting" (*gyo*) contains a sense of "dialogue" as "historical operation" or "experiment" in a continuum of "knowing and Acting" (*chi to gyo*), which he had once originally proposed in 1936. This finding led to his unique concept of dialogue. This paper details the aforementioned development of Yanagida's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he received from Nishida's Philosophy.

壹、前言

柳田謙十郎（1893-1983）就學京都帝國大學期間不曾受過西田幾多郎（1870-1945）的指導，戰後又因轉向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因此在日本哲學史上處於複雜的位置。¹柳田稱自己：「雖是京都學派，但又不是其形成的主流，只是因西田老師、弘文堂的關係而緣分加深，中途成為其中一員」。²事實上，柳田在臺北帝國大學時期開始接觸西田哲學，繼承了西田的無的思想。³正如竹田篤司所指出，柳田的存在必無法和京都學派切割開來。⁴西田閱讀柳田的文章〈知と行——實存的思惟としての哲學の行為的意義について〉（中譯：〈知與行〉）對柳田予以很高的評價。

你我素未謀面，但你卻能掌握到我哲學中的感性。我拜讀了你的論文。〔……〕柳田僅讀了我的書籍卻理解我其中的感性。從此事中我感到自己的想法原來是可以被他人理解的，這增加了我的自信。⁵

受西田讚賞的柳田是如何接觸西田哲學，並展開獨自的哲學呢？關於此點鮮少被人探討。對於柳田哲學的探討，至今為止都只停留在一些片段的介紹，⁶很少有以柳田哲學為主題的研究。根據渡部清，一般對西田哲學

-
- 1 田村航：〈昭和十年代の西田哲学——柳田謙十郎の教学官就任問題をめぐって——〉，《学習院大学史料館紀要》，第12號（2003年3月），頁100。
 - 2 柳田謙十郎：〈わが思想の遍歴〉，《自叙伝》，收入《柳田謙十郎著作集》，第1卷（東京：創文社，1967年），頁106。
 - 3 大橋良介：《京都学派と日本海軍——新史料「大島メモ」をめぐって》（東京：PHP研究所，2001年），頁13。
 - 4 竹田篤司：《物語「京都學派」》（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頁307；田村航：〈昭和十年代の西田哲学——柳田謙十郎の教学官就任問題をめぐって——〉，頁100。
 - 5 西田幾多郎：《書簡集》，收入《西田幾多郎全集》（舊版），第19卷（東京：岩波書店，1978年），頁18-19。
 - 6 關於柳田對馬克思主義與人文主義的見解，出自黑田寬一：《ヘーゲルとマルクス——技術論と史的唯物論・序説》（東京：現代思想社，1968年）。

的研究方法向來是「有疏於冷靜客觀的研究方法」。⁷他所謂疏忽的主要論據，來自「師生之間的情誼關係」。而柳田對西田哲學的偏愛，亦屬此類。然此一渡部的批評並不恰當。柳田在臺期間雖大量閱讀西田的著作，並對其哲學感同身受。但另一方面，柳田在自己的〈西田哲學筆記〉裡，卻又對西田的唯物論理解進行批判。⁸這正說明了柳田在臺的上半期間已抱有自己的問題意識，並據此對西田的著作展開批判性的解讀工作。戰後，柳田更是以唯物論的立場對西田哲學進行批判。

柳田在遠渡臺灣之前，就學於京都帝國大學，專業是倫理學，受藤井健治郎（1872-1931）的指導。柳田積極參加批判馬克思主義的特別講座，不曾缺席。受河上肇（1879-1946）、岩田義道（1898-1932）等人的影響，他對贊同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兩個立場都有其關心⁹。柳田畢業論文的題材在藤井的建議下從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和魯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 1856-1938）兩者中選定了施塔姆勒，總結論述了經濟和法律（*Wirtschaft und Recht*）。¹⁰經濟學的代表學科對象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曾是柳田遠渡臺灣邂逅西田哲學之前的關注點。這也給予了柳田日後獨特性地解讀西田哲學以一定的方向性。

在臺期間，柳田潛身於哲學並發表了一系列著作（表一）。其中，在《實踐哲學としての西田哲學》（中譯：《作為實踐哲學的西田哲學》）一書中，柳田對於對象科學中主觀從片面的觀點出發混淆事物對象，只從局限的部分看事物的整體的傾向提出了如下的質疑：

脫離歷史，對象性地研究社會、社會與個人的關係、與環境的關係；不在物與其具體位置之間的矛盾統一關係中思考現象，而僅

7 渡部清：〈日本哲学研究の新たな開始にむけて——「西田哲学」の独自性を検証する試みをとおして——〉，《國際哲学研究》，第3號（2014年3月），頁109-123。

8 學習院大學史料館（編）：《西田幾多郎關係資料目錄：付全集未收錄書簡》（東京：學習院大學史料館，2002年），頁20。

9 柳田謙十郎：〈わが思想の遍歴〉，頁72-74。

10 正式名稱是 *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中譯：《基於唯物史觀的經濟與法》），初版為1896年，第二改訂版為1906年。這期間韋伯於 *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1904年）中對此進行了批判，對第二改訂版更是徹底的批判。

從物的性質這個角度來進行思考——這便是固有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存在的抽象性〔……〕經濟學、社會學等學問，難道不應該站在上述立場，從矛盾的自我統一關係出發，重新深刻審視一下自己的方法論應該如何定位嗎？尤其是經濟學的方法實在令人堪憂。但願這只是門外漢的杞人憂天。¹¹

在科學的、物質主義地看待事物的方法以及經濟學中對象性地看待事物的方法在臺灣大肆擴張之中，柳田意識到了強烈呼籲人們克服這種片面思考方式的必要性，取而代之，他希望人們能夠深刻地去探究與捕捉人類精神的整體性。對此，柳田在〈躍進臺灣と精神文化〉（中譯：〈躍進臺灣與精神文化〉）中寫到：「臺灣地屬南方地域的發展中心，理應振興偉大優秀的世界精神文化」。¹²柳田認為臺灣地處日本文化與西歐發展的交錯點，應該成為融合東洋精神文化與西洋物質文化的第三種社會發展模式。

正值當時，臺灣的很多哲學家們熱衷於哲學的方法論與「種」（社會）的關係之討論。從昭和十一至十四年（1936-39）發刊的《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可知，當時文政學部的很多教授關注社會（種的共同體），針對此主題發表不少文章。例如，務台理作（1890-1974）在〈ヘーゲル精神現象學と客觀的精神〉（中譯：〈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與客觀的精神〉）中，指出黑格爾（1770-1831）的精神的意義在於「人倫世界」，即「置身於如法、家庭、社會、國家等客觀共同體的世界中實現自我」。¹³又如曾是務台助手的洪耀勳（1903-1986），以〈存在と真理——ヌツビッセの真理論の一攷察——〉（中譯：〈存在與真理：對於努茲比塞的真理論的一個考察〉）為題，主要探討了哲學的方法論與真理之間的關聯，然而做哲學的主觀（思維者）「所發現的真理無法離開根據人類的種（Spezies）而命名的事物之界限」。¹⁴當時文政學部的哲學家們如此熱衷

11 柳田謙十郎：《實踐哲學としての西田哲學》（東京：弘文堂，1939），頁 378-380。

12 柳田謙十郎：《實踐哲學としての西田哲學》，頁 304

13 務台理作：〈ヘーゲル精神現象學と客觀的精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第 1 輯（1935 年 5 月），頁 424。

14 洪耀勳：〈存在と真理——ヌツビッセの真理論の一攷察——〉，《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第 5 輯（1938 年 9 月），頁 209。

於哲學的方法論與種（社會）的關係之討論，那麼，柳田在臺期間又是如何在哲學思索上與這些哲學家產生互動的呢？這是今後需研究的課題。

以上述背景為基礎，本文以下將藉由表一來考察柳田在臺期間的諸論文（按年月順序），來闡明柳田哲學的獨創性及其開展過程：

【表一】柳田謙十郎任職臺北帝大時期所發表之著作

時間（元號／西曆）		著作
昭和十年 （1935）	6月 ¹⁵	〈フイヒテの道德學に於ける形式主義の克服〉 （中譯：〈費希特之道德學形式主義的克服〉）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第2輯
昭和十一年 （1936）	9月	〈知と行——實存的思惟としての哲學の行為的意義について〉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第3輯
	12月	〈躍進臺灣と精神文化〉 （中譯：〈躍進臺灣與精神文化〉） 《臺北帝國大學記念講演集》，第5集
昭和十二年 （1937）	9月	〈辨證法的世界の倫理〉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第4輯
昭和十三年 （1938）	6月	〈エロスとアガペ（上）〉，《思想》，6月號 （中譯：〈Eros 與 Agape〉）
	7月	〈エロスとアガペ（中）〉，《思想》，7月號
	8月	〈エロスとアガペ（下）〉，《思想》，8月號
昭和十四年 （1939）	2月	《辨證法的世界の倫理》（岩波書店）
	2月	《日本精神と世界精神》（弘文堂） （中譯：《日本精神與世界精神》）
	12月	《實踐哲學としての西田哲學》（弘文堂）
昭和十五年 （1940）	4月	〈日本思想の現在及將來〉 （中譯：《日本思想的現在及將來》） 《世界精神史講座 第1卷・日本精神》（理想社）
	12月	《行為の世界》（弘文堂）

15 《自敘伝》，收入《柳田謙十郎著作集》，第1卷，頁586中記錄為1934年，這裡根據年報的發刊年月日記載（部分修改）。

貳、與臺灣的邂逅



【圖一】柳田謙十郎發表之〈官立精神病院設立の必要〉

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四月十日，柳田帶領全家到臺灣（基隆港）。回顧過往，他將在臺灣渡過的十二年時光稱為「蕭條時期」，並說：「臺灣的生活從一開始一直不隨我的心意。到處都是很新鮮的事物，但是我感到的不是好奇而是厭惡。」¹⁶事實上，到臺灣後，柳田的二女兒節子罹患傷寒，妻子因流產而精神衰弱不安定，最小的孩子小綠也因身體不好常生病。當時柳田的低迷情緒，從柳田投稿到《臺灣日日新報》（昭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官立精神病院設立の必要〉（中譯：〈官立精神病院設立の必要〉）中可窺見。文章開頭處，柳田提出設置精神病院的請願，並如此訴求道：「知識階級求職於偏遠的殖民地，其苦痛中有共存著一種悲哀的心理。」¹⁷

柳田在殖民地臺灣感受到的文化差異可想而知。但也因為作為外來人的柳田與異地臺灣的邂逅，使他產生很大的變化，開始深入探索人性與哲學。一九四〇（昭和十五年）年八月二十九日，在給西田的書信中，柳田如此說道：

16 柳田謙十郎：〈わが思想の遍歴〉，頁90。

17 柳田謙十郎：〈官立精神病院設立の必要〉，《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3月27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資料。

九月二十日從神戶坐船出發回到臺灣，再次回歸到原始的孤獨，打算勤奮學習。在臺灣我沒有朋友，甚至連說話對象都沒有，雖然非常寂寞，但這也正好可以讓自己靜下心來潛心進學。¹⁸

這段時期，柳田沉浸在孤獨及哲學中，正如他所說，「這段時期對我來說是奠定基礎的重要時期」。¹⁹離臺前所出版的《行為的世界》是柳田日後獲取京都帝國大學博士學位而提交的重要著作。其中，他是這樣再次描述自己與臺灣的邂逅：

自然風土作為能產的自然是孕育我們歷史、民族的母親，人類是大地的子女。櫻花因其所適應的風土而呈現出淡淡的嬌紅，而將這櫻花移植到臺灣的土地上則會變成一種濃艷的緋櫻，²⁰倘若移到歐洲則會變成純白無香。〔……〕人類行為的限定如何從息息相關的自然生命中將自己分離呢？正所謂人是自然之子，人只能作為自然之子成為歷史的一部分。²¹

此引文可間接看出和辻哲郎（1889-1960）的《風土》（1935年）之影響。運用西田的〈私と汝〉（中譯：〈我和你〉，1932年）。之理論，柳田將臺灣自然置換成「你」，亦即他者的位置上。柳田在此的意思是，「衍生民族歷史的自然」是我們人類不可欠缺的。在不同自然培育出的不同文化背景中，有絕對不同的他者，我和我的邂逅也因這種差異而更加意味深長。

到達臺灣後，柳田開始研究費希特（1762-1814）的哲學，受挫後曾考慮過放棄哲學回歸農村做一名普通老百姓。正在此「蕭條時期」，柳田遇到了西田哲學。大約在一九三五年期間，柳田開始熟讀西田的著作。其中，柳田格外喜愛《無の自覺的限定》（中譯：《無的自覺限定》），百

18 學習院大學史料館（編）：《西田幾多郎關係資料目錄：付全集未收錄書簡》，資料號碼：E-25，頁159。

19 柳田謙十郎：〈わが思想の遍歴〉，頁94。

20 臺灣本土的五瓣櫻花，特點是花瓣不平開。

21 柳田謙十郎：《行為的世界》（東京：弘文堂，1940年），頁34-35。

讀不厭，因為此書收錄了〈我和你〉一文。²²

參、〈知與行〉

柳田的西田哲學研究成果〈知與行〉揭載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第3輯，1936年）。此文章得到了西田很高的評價。

23

在〈知與行〉中，柳田認為哲學（知）並非從觀想生活（讀書、思考）中所能得到的淺薄知識，而是一種「和包含意志、感情以及身體行動的實存本身的整體結構關連中的人格內在發展之聯繫」。我們在現實生活的「實踐」（行）中所面臨的「危機」，會激發我們思維中的「危機」。言語（寫在紙上的文章）、其他身體行為以及實踐的意思限制都只不過是「表現」形式的一種而已。也就是說，像讀書、寫文章這種思考表現，始終離不開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相遇、人生悲喜等因素。如此看來，所謂「哲學」與其說是「知」，不如說是積極的「行」，是現實的「行為」。他指出「理論思維是實踐行為的『一種』形式」。因此，「對於哲學家而言，通過直觀和概念思維的方式深刻把握實在的真相，是規定他實踐意義的最重要契機」、「如果說一個人經常思維思考，那也就是說他經常在進行實踐」。²⁴

如上所述，知在廣義上意味著哲學、思考，行則對應實踐，這是柳田哲學最重要的基礎。例如，在《日本精神與世界精神》²⁵的〈英雄と天才〉（中譯：〈英雄與天才〉）中，柳田對「英雄」（即「行」），「天才」

22 柳田謙十郎：〈わが思想の遍歴〉，頁96。

23 〈遍歴〉中紀錄柳田是因〈知與行〉的契機而與西田相知相遇，但實際上正如田村航〈昭和十年代の西田哲学——柳田謙十郎の教学官就任問題をめぐって——〉所指出的，兩者在〈知與行〉之前便有交流了，這一點可以通過昭和十年（1935）9月19日的書信（收藏於學習院資料館）中清楚可見（頁128）。

24 柳田謙十郎：〈知と行——實存の思惟としての哲學の行為的意義について〉，《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研究年報》，第3輯（1936年9月），頁351。

25 柳田謙十郎：《日本精神と世界精神》（東京：弘文堂，1939年）。

（即「知」）這兩個共屬於「種的共同體」卻有不同創造性的個體進行了論述。當時田邊元提出「種（社會）的理論」，與西田哲學相對立，但柳田卻認為兩者的哲學處於「密切相輔的關係」。²⁶柳田一邊積極認同田邊的個體與種的相互否定媒介的觀點，但同時又認為這是在「個體的存在基底」下承認「種的統一」，而個體「不是在遠離自己的種族社會而孤立自我，而是因此重新深深地與歷史社會相結合，從而樹立起更高水平的社會性自我。」²⁷在此所說的種「藉由創造性的個體不斷打破種族的傳統，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過程中得以重塑。唯有此才能生成真正的歷史。」²⁸也就是說，「種族是在通過對自我種族存在進行否定中，所分裂出的多元化之個體。從中，我與你的對立關係衍生出來」。²⁹

柳田進而將那具有創造性的個體描述為兩種類型的歷史人格：一個是與時代精神、群眾同步的，擔當社會創造角色的「英雄」，另一個是與社會保持「距離」的、孤獨的「天才」（追求普遍的知識根源，創造歷史的天才）。柳田認為通過這樣的「人格」，「種」會「邂逅自己以外的事物」，³⁰通過樹立起「我與你」的關係，世界才會創造性地發展下去。從所謂「邂逅」到「歷史的根底」，「哲學」貫穿其中。柳田之所以將「哲學」與「種」的發展結合在一起，全然來自其自身的異文化體驗反映在其哲學的結果。

肆、〈行為與直觀〉

在上述環繞在「種」概念的「知與行」之理論，在柳田赴任臺期間出版的《作為實踐哲學的西田哲學》中有了更大的發展。相對於小坂國繼認為此書完全「切合西田的哲學思想」，³¹筆者則認為此書潛藏著柳田自身獨

26 柳田謙十郎：〈日本思想の現在及將來〉，《日本精神》，收入《世界精神史講座》，第1卷（東京：理想社，1940年），頁330。

27 柳田謙十郎：《辨證法の世界の倫理》（東京：岩波書店，1939年），頁86。

28 柳田謙十郎：《日本精神と世界精神》，頁40。

29 柳田謙十郎：《辨證法の世界の倫理》，頁104。

30 柳田謙十郎：《日本精神と世界精神》，頁52-53。

31 小坂國繼（編）：《柳田謙十郎集》，收入《西田幾多郎研究資料集成》，第6卷（東

特的觀點。

柳田在其〈序〉文中說明此書是以：

掌握西田哲學為西田幾多郎這位哲學家本身的「行為的直觀」而命名的。³²

如果說哲學的真正問題存在於人生問題中，哲學的真正動機離不開能動自我的矛盾現實中的煩惱。³³

那麼西田自己的哲學也應該可以這樣被詮釋。

從此觀點來閱讀該書時，應注意柳田提及了當時西田剛發表不久的〈經驗科學〉（《思想》，第207號，1939年。同年11月收入《哲學論文集 第三》）。因為《作為實踐哲學的西田哲學》的初版是昭和十四（1939）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是在西田這篇文章公佈的後三個月。柳田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該文章。柳田在備註中做出以下說明：

〈經驗科學〉這篇論文是西田博士的近作，為敘述的方便，在此提及。西田哲學在後節中論述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已經是一個非常完整的體系。我仿佛能夠感受到〈經驗科學〉這篇論文打破傳統形式，孕育出新事物的生命胎動。西田博士年到古稀，卻仍能讓人感受年輕鮮活生命的發展，這種不屈的精神，在下只能甘拜下風。³⁴

柳田在此將西田哲學的發展比作「沸騰躍動的實踐生命」，認為全文都是一個「天才的個性生命發展」的「行為的直觀」。〈經驗科學〉對柳田而言，正是可讓人感受到「發展的生命」的論文。

京：クレス出版，2012年），解說，頁2。

32 柳田謙十郎：《實踐哲學としての西田哲學》，頁8。

33 柳田謙十郎：《實踐哲學としての西田哲學》，頁216。

34 柳田謙十郎：《實踐哲學としての西田哲學》，頁372-373。

然〈經驗科學〉在戰後的西田哲學研究脈絡裡，卻未受到特別的關注。柳田何以將目光投向這篇論文呢？當時他是如何參考西田哲學而創造出自己的思想呢？解答這些問題的線索正在〈經驗科學〉這篇文章中。

伍、〈經驗科學〉的邂逅

此處將對柳田赴任臺灣期間出版的《作為實踐哲學的西田哲學》進行解讀。西田在〈經驗科學〉指出我們對知識所固有的科學的經營方式是「行為的直觀」。此觀點首先是以物理學家布里奇曼（P.W. Bridgman, 1882-1961）提出的「操作（的）」（operational）觀念為依據，這在人類的「思維」（思考）行為上指引了一個新方向。也就是說，把科學研究者的「實驗」這一行為的「手續」視為他們的「行為的直觀」。西田在此重申了「哲學」對其他科學所代表的獨特意義。

若說到抽象或分析，應該說明是站在何種立場、從何種角度出發的。在以科學經驗為基礎來論述哲學的人當中，不乏有人會脫離原有立場而考慮現實世界的事物。他們會認為客觀現實世界，就是否定主觀世界。我們應該做到，比所謂的經驗論者更徹底，比所謂的客觀主義更徹底。³⁵

一般來說，對象科學將主客分離，「從可思考的世界中思考世界」。³⁶從上述引文可知，西田不僅否定了此立場的觀點，並指出實驗只是其中一種操作表現方式。這表示出西田希望我們能超越對象科學的思考局限。³⁷在說到「思維」是「歷史操作」這一點上，西田認為科學家的思維與普通一般人的思維並無區別，「不管是我們吃穿住行的日常，還是偉大的政治家、

35 西田幾多郎：〈經驗科學〉，《哲學論文集 第三》，收入《西田幾多郎全集》（舊版），第9卷（東京：岩波書店，1950年），頁240。

36 西田幾多郎：〈經驗科學〉，頁252。

37 西田幾多郎：〈經驗科學〉，頁250-251。

學者所從事的工作，這一切都是矛盾統一的歷史操作」。³⁸

關於上述「歷史的身體操作」這種「思維」立場，西田與柳田都把目光放在德國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 1890-1947）所提出的「拓補心理學」（Topological Psychology）之上。西田評價此心理學「不將精神現象看作個別存在的事實，而是看作為某環境中的或某人的一個具體的位置表現」，此處的具體位置即「矛盾的自我同一世界」。³⁹勒溫不用抽象概念來概括「現象」，而是將其視為「具體的位置表現」，將人與環境的具體位置關係看作心理生命空間（psychological life space），並用如下的函數關係來表現：

$B=f(S)$ ：B=發生的事情、S=具體的位置

$B=f(PE)$ ：P=人、E=環境⁴⁰

以上函數所表示的「生命空間」是「可能會發生的事情的整體」，這一「環境」旨在探究在「此位置」上，或是對於某些人而言，什麼是可能的而什麼是不可能的。「將人本身考慮為一個空間，人與這個空間環境的關係。諸如欲求、情緒、行為等則可以被科學地看待。其所關聯的生命空間須是固有的歷史空間。個人的意識空間也必須放在其中考慮才可以。」⁴¹

將思維看作是歷史的身體操作，意味著置於某一特定環境（場所）的人們根據思維選擇更好適應環境的意志、欲求和人格。這是勒溫的劃時代建議，意在涵蓋個人「在『關係』中進行『選擇』」的「思維」，改編經驗科學。

西田認為，自然科學的實驗是將「制作的（poiēsis）自己」（主觀）置之事外，與此相對，「社會科學正好相反，通過涵蓋無處不在的制作的（poiēsis）自己」而達到「所謂的客觀」。⁴²柳田從西田的〈經驗科學〉一

38 西田幾多郎：〈經驗科學〉，頁 298-299。

39 西田幾多郎：〈經驗科學〉，頁 254。

40 西田幾多郎：〈經驗科學〉，頁 274。

41 西田幾多郎：〈經驗科學〉，頁 275。

42 西田幾多郎：〈經驗科學〉，頁 295。

文中感受到的「生命的胎動」（前文提及），是從事情的整體的「場所」內部出發看待人類對象的思考，也就是將整個世界視為對象來思考，在此基礎上達到主客對立。在「知與行」中，與知（哲學·思考）相對應的「行」，也可被看作是「歷史性的身體操作」（實驗）。

值得關注的是，上述西田的觀點實際上超越了勒溫心理學。確實勒溫把位處環境中的個體行為看作為歷史性操作的現象，但是他沒有考慮到研究這一現象的研究者（實驗者）的歷史性行為，因而也沒有可能在其「拓樸心理學」中論述它。西田在其「經驗科學」論文中之所以提出比勒溫更加先進的想法，是因為西田參考了亞里士多德（384-322 BCE）及伽利略（1564-1642）的思想（後文會提及）。

陸、行為直觀學與行動研究

西田與柳田所見的「拓樸心理學」，隨著勒溫的思想轉移有了改變。因為勒溫將它發展為「場所理論」（Field Theory），使得原本只是為了理解個人的心理學方法，上升成為研究「變化的集團」的方法論。⁴³從原本代表生活空間的心理·認識環境演變為心理場所和力的場所（psychological-perceptual environment- psychological field-social field-force field）。

誕生於一九二〇年的勒溫「場所理論」（Field Theory）據說受到了格式塔心理學以及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 1874-1945）的哲學（尤其是 *Substantz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1910）的影響。⁴⁴西田因勒溫而關注伽利略的思想，實際上也是受到卡西爾的科學基礎論之影響。

原本卡西爾是從精密科學領域來研究認識論，並未接觸過社會科學。勒溫在柏林大學研究生時期（1910年），聽了卡西爾的課後覺察到，數學理論不僅可用於自然科學的分析，也可應用於心理學·社會科學的領域。

43 Bernard Burnes, "Kurt Lewin and Complexity Theories: back to the future?," *Journal of Change Management*, Vol. 4, No. 4 (Dec., 2004), pp. 309-325.

44 Bernard Burnes and Bill Cooke, "Kurt Lewin's Field Theory: A Review and Re-evalu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Vol. 15 (Sep., 2012), pp. 408-425.

勒溫的此種想法是源於卡西爾的發現，即科學（尤其是物理學）的基礎理論必須奠基於思考模式的轉換。⁴⁵

此轉換位於亞里士多德的思考與伽利略的思考形式之間，這是它的特點。基於亞里士多德思考形式，概念是在多種多樣的事物的實體及其關係中，通過知覺提取共同要素而形成，是以推論為前提的。根據對象事物所展現出來的共同性質而進行推論，進而得出比「種」更高層次的「類」，如此反復，將事物進行等級化和分類化，從而得出所要的「概念」。⁴⁶其中，個別存在的某一事物現象可能偶爾會在概念分類中被忽略掉。

另一方面，伽利略的思考方式並不是基於對世界的感知與觀測，而是先假設諸如「加速度」（運動）這一觀念是存在的，進而運用函數概念等事實來驗證，用一次實驗（鐵球落地實驗）來驗證其真理的普遍性。換言之，科學家的感官和感知即所謂的主觀性，是通過（數學）思維而上升為普遍真理的，通過實驗操作來論證經驗。

因此，伽利略不是以感知、感覺來推論出現實的事實，而是將用思維勾勒出來的現實作為對象來研究。卡西爾參照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話，將這種思考形式命名為「對象思維」（gegenständliches Denken）。⁴⁷實驗這種所謂的實踐，並不是為了發現現實世界所內涵的普遍法則，只不過是用來驗證研究者主觀創造出來的理論概念而進行的操作。⁴⁸

上述的亞里士多德與伽利略思考方式的對比，是先由卡西爾提出，勒溫繼承發展，進而受到西田與柳田的關注與研究。西田在〈經驗科學〉一

45 安村克己：〈カッシーラー哲学とレヴィン心理学——社会学の科学基礎論に関する一考察〉，《応用社会学研究》，第31號（1989年7月），頁1-13。Ernst Cassirer, *Zur Einsteinschen Relativitätstheori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Betrachtungen*. (Berlin: B. Cassirer 1921), pp. 10-11.

46 Ernst Cassirer, *Substanz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Grundfragen der Erkenntniskritik* (Berlin: Verlag von Bruno Cassirer, 1910).

47 Gregory B. Moynahan, *Ernst Cassirer and the Critical Science of Germany, 1899-1919* (London &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4), p. 170.

48 Alfred Marrow, *The practical theorist: The life and work of Kurt Lewin*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69), p. 30.

文中指出了社會科學的意義。以此為出發點，柳田對「知與行」進行了延伸的研究，指出由「思考」而提升的思想，「實際是基於行為直觀的實驗」。⁴⁹

筆者已於上面的論述中提到存在於知（思考·哲學）之中的行（實踐）的意義。柳田因西田的〈經驗科學〉，開始思索存在於行（實踐）之中的知（科學）的作用。伽利略的自由落體法則中，直觀現實時機的（人的）思維是由自由創意（*freie Erfindung*）及數學方法所表現，並假設其是普遍法則，利用物理實驗來驗證。此處，自然科學世界的因果關係是存在於研究者的對象思維之中，其真實性是藉由實驗操作來得到證明。這若放在社會科學之中，研究者藉由思維而提出「理論」（知）的假設，必須在具體解決社會問題這一「實踐」（行）之中來驗實其理論的客觀真實性。

勒溫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從德國移居美國後，改變研究方法，從單純的實驗「觀察者」轉變為問題的「參加者」（*participant*）。從「場所理論」轉變為「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⁵⁰這是對西田所提出的包含「制作的自己」（對象思維）的行為直觀的「實驗」（社會科學）這一點的繼承發展。

行動研究是指研究者本身通過具體參與到解決社會問題的實踐之中的研究方法，來論證自己理論的客觀真實性。正如勒溫所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There is nothing so practical as good theory*”），⁵¹「知與行」是互相相關不可分離的關係。這也是當今國際·地域開發學中的「參加型開發」、「參加型調查」（*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Participatory Appraisal*），以及教育學中的「參加型學習」、「服務型學習」等理論的源泉。

架起勒溫、西田與柳田之間橋樑的另一個共同點在於，看待將思考

49 西田幾多郎：〈經驗科學〉，頁 267。

50 Erling Eng, “Looking back on Kurt Lewin: From field theory to ac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4, No. 3 (1978), pp. 228-232.

51 Kurt Lewin,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 Dorwin Cartwright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1), p. 51.

（知）與實踐（行）合為一體的「問題」（歷史課題）的視點。在原本的拓捕心理學中，勒溫如此看待圍繞著思考與實踐的「問題」。

在心理學上，那些成為真理的偉大思想，也只不過是存在於模擬概念的世界的東西罷了。因而人們開始研究數學問題。最初，一切並不清晰，也沒有具體的構造。但最終人們找到了具體特定的關係，並開始解決問題。這種思考的進步（*progress in thinking*），在心理學上屬於真實的事件（*a psychologically real event*）。通過反復操作，進而選擇出合適的方法。⁵²

上述引用文說提及的解決「問題」的實踐性，是指把研究者主觀所制定的「理論」（知）看作是解決社會問題（勒溫在後文中特意提出了少數民族問題）的實驗。換言之，研究者所擁有的客觀性實際是檢驗其提出的「問題」（假說）與研究對象的（當事者）的實際生活問題是否一致的客觀性。在兩者共同的實際（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研究者的假說、實驗及實踐的客觀性才能地以證實。勒溫認為，即便不同領域的學問提出各自不同的「根隱喻」（*root-metaphor*），為解決社會紛爭問題，我們仍需考慮一個綜合系統（*comprise a single well-integrated system*）。⁵³這正是西田在〈經驗科學〉的後半部分所提及的「矛盾」，這是西田對勒溫上述關於「問題」觀點的繼承發展：

如何知道世界是自我矛盾的？通過了解自我矛盾，來知曉這個問題〔……〕我的自我矛盾即是世界的自我矛盾〔……〕世界，並不是一個與我們對立或與我們互相限定對方的對象，而是包含我們的存在，我們存在其中。因而將其稱之為客觀世界〔……〕將世界的自我矛盾與個人的自我矛盾分開考慮，是因為在抽象意義

52 Kurt Lewin, *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 Fritz Heider, Grace M. Helder (trans.) (London &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6), p. 49.

53 Kurt Lewin,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selected papers on group dynamics*, Gertrude W. Lewin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8), p. ix.

上將兩者分開來了。⁵⁴

勒溫後期投身於行動研究，是因為他看到了如同上述引文所說的，研究者的思考的客觀性是源於其所選定的研究對象的問題（矛盾）與現實社會（世界）問題（矛盾）的重合點。研究者在包含制作的自己的實踐中獲得所謂操作性的實驗客觀性。而「哲學」的「行為的直觀」的實踐也源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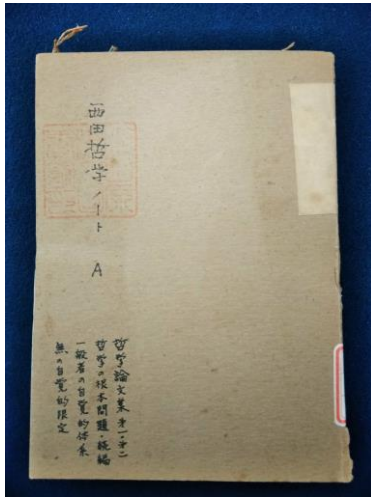
以上西田的洞見，進一步引導柳田在《作為實踐哲學的西田哲學》中所提的觀點：「在歷史的、身體的操作的一端，在我們試圖表現世界的過程中產生了心理學」，「物理學也是在我們試圖表現世界的背景下誕生」，進而「在自我同一世界的形成中各種社會科學誕生」。由於「歷史性社會操作」，「經驗科學通過制作（*poiēsis*）性地看待事物，從而看到自我」，而「社會科學」的「真諦」是「行為的直觀學」。⁵⁵

作為「行為的直觀學」的社會科學，具體是怎樣一門科學呢？展開對此問題的探索，柳田離開西田哲學，開始了自己獨特的思考——「對話的邏輯」。

54 西田幾多郎：〈經驗科學〉，頁 297-298。

55 柳田謙十郎：《實踐哲學としての西田哲學》，頁 377。

柒、對話的邏輯



【圖二】柳田謙十郎著〈西田哲學筆記 A〉⁵⁶

在臺期間，柳田寫有〈西田哲学ノート〉（中譯：〈西田哲學筆記〉，未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版的《西田哲學體系》，則是柳田在沐浴著戰亂的「炮煙彈雨」，「被迫從防空洞中進進出出」中，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創作出來的。「身體也許會因戰亂而垮掉，但這份工作會一直留存於這個世界。」⁵⁷這套柳田堅持不懈，不遺餘力創作出來的著作，共有三部十二冊，一千三百餘頁。可能是因為沒有被收錄到《西田幾多郎研究資料集成》里的緣故，柳田這本大部頭著作並沒有得到大多數研究者的分析和引用。小坂國繼（1943-）稱這套書實質上與《作為實踐哲學的西田哲學》一書重複。但實際上，在這套書籍第一冊《場の哲學》（中譯：《場所的哲學》）與第四冊《絶対矛盾的自己同一》（中譯：《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中，柳田有註明「作者基於自己的構想，自己（自由）的立場進行了敘述」。筆者在前面已詳述了柳田針對西田〈經驗科學〉所展開的自身獨特的哲學思想。這套書應該是柳田邂逅臺灣（即異邦人柳田與異地臺灣

56 圖片來源：〈西田哲学ノート A〉，日本神奈川縣小田原圖書館藏品，未出版，2017年7月31日作者攝影。

57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收入《西田哲學體系》，第1冊（東京：大東出版社，1946年），頁1。

相遇) 後的思想匯總。

柳田認為，在這個面對「環境現實的矛盾」危機所帶來的「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應該怎樣生存下去」等歷史課題，應意識到在這個「必須徹底超越科學認識的立場，必須將自身深化到哲學認識的立場」之時代，「哲學應該作為科學的科學，真理的真理之學」，以及「作為實在的最高統一認識之學」。⁵⁸柳田將異於科學的哲學之「具全新方法的獨特立場」視為一種「對話」(Dialogos)的立場。筆者認為這裡有柳田對西田的「我和你」之理論的運用及自身獨特的「知與行」之理論的發揮。

我們成為主觀，對象成為客觀，自己將對象抽象化並進行研究的科學方法，同時可被看作是我們日常生活經歷的世界。⁵⁹如此對象化地觀察事物，會使研究對象因主觀或固定觀點的局限性而孤立化，此立場只能抽象地把握現實世界。換言之，要想認識現象的具體情況，必須把握相關事物的「環境世界」，⁶⁰「必須涉及那事物所存在的世界性場所的整體」。⁶¹

柳田以社會關係為基準，將研究者對待他人言行應採取的姿態分類為「獨語的」(Monologos)與「對話的」(Dialogos)兩種。「在獨語的世界，不存在對他人的想法和發言進行否定、批判或反擊的行為」。此理論側重於維持內在秩序與統一的封閉性維持。這種理論即是「分析思維的理論」，具有「內在沒有否定媒介的對象事物理論的性格」。⁶²獨語的理論認為「回答本是為對應問題的存在，根據不同的問問題方式，回答的方向和內容也會被限定」。也就是說，主觀對象性地看到的客觀事物的「一面」，對應這種問題方式，會得到其相應的回答。在此「無論何時何處我們都應該作為無私的傾聽者而不是傾訴者。讓自然傾述一切」，這是研究者(自然科學)所應該有的客觀態度。⁶³若從此種態度達到「透過一定的操作，從

58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頁 14-15。

59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頁 22。

60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頁 45。

61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頁 29。

62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頁 58。

63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頁 59。

外部來學習以我們的主觀限定根本無法怎樣的事實」⁶⁴這種姿態的話，就能進入回應自然法則的階段，並達到對話的理論。

對話（Dialogos）理論的對象界即是「自己在與非自我的他者之對立中生存、受苦、行動、實踐這種真實的歷史現實世界」。⁶⁵此即為筆者在開頭介紹的「我與你」的世界。此世界中，「環境與主體是相互問答並相互限定的，是制作性的互相影響的世界」。「對話」是「對環境中的他者『你』做出應答」，作為具體行為以及「歷史實踐」的邏輯構造具有「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的性質特點。⁶⁶這樣的「環境與主體的對話，是和相隔萬里深淵的、完全（絕對）不同的他者之間的」對話，是和「自己之外的」「不安的世界」的交涉。⁶⁷真正的實踐（行）的對話，就存在這樣的世界裡。⁶⁸

柳田把「我與你」這樣不同之人的相遇，看作是「創造性」的「絕對無」的「場所」，「能進行對話的人必須在自己的深處擁有主體性〔……〕我與你只有各自都是擁有獨立人格的主體時，真正的對話才能進行」。⁶⁹因此，「自己深刻地自主地限定自己這一件事，實際是因矛盾對立的環境而起，因而將環境作為課題來解決，而這面對環境的自我獨立」即是所謂的「否定的媒介」。⁷⁰

以上是柳田在西田的〈我和你〉及〈經驗科學〉的影響下，所思考出來的「對話的邏輯」。這也是將「對話」（「你」這個否定媒介）這個歷史性操作（即實驗）置位於「知與行」的「行」之中，從而指明產生「知」（哲學）的獨特哲學式實踐（行）的意義所在。通過柳田與異文化（臺灣）的相遇，通過與西田哲學相遇，可以最後概括出以上所述的「知」（哲學）與「行」（對話）的邂逅。

64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頁 60。

65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頁 62。

66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頁 63。

67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頁 66。

68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頁 68。

69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頁 76。

70 柳田謙十郎：《場の哲學》，頁 71。

捌、結論：戰後柳田的轉變

作為結論，筆者認為柳田通過與臺灣的邂逅，最終提出了作為「知」的實踐意義（行）的「哲學」，以及作為「行」的實踐意義（知）的「對話」這一獨特的理論。柳田在與臺灣這樣的「你」邂逅之後，親身體驗與絕對不同的你對話，其實是在戰後西田去世之後。古在由重（1901-1990）在追悼柳田時提到這個對話的場面：一九四八年，深受西田哲學影響的柳田，曾應學校當局要求做演講。在疑問解答環節中，有一名青年提出了強烈的異議：

當時被提問後的老師的樣子，至今難以忘記。老師將臉趴在桌子上，沉默了很久。一語不發〔……〕當時最終是以雙方的沉默結束的。但是那一瞬間的印象比雄辯更加強烈，此場景至今仍留存在我的心中。⁷¹

上述引文中所提的場面，是為西田哲學所傾倒的柳田，與「大眾」（青年）這位「他者」（你）相遇的場面。之後柳田轉向共產主義·唯物論領域，對西田哲學進行了強烈的批判，但這並不是因為柳田倒向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於柳田來說，這正是對西田哲學（知）的實踐（行），正如「哲學的真理，是通過現實的『實踐』，『驗證假說所得到的真理』」⁷²一樣。換言之，將「工作勞動的人們」、「樸素的大眾」的「生活體驗」作為「驗證的根據」正是哲學家（或者說是自己）所追求的。⁷³「西田哲學中蘊含著諸多深刻的真理」，但是若不經歷上述所說的實踐（即所謂的對話/操作性實驗），「可以說是等於抹殺了此哲學所擁有的、真正的歷史生命〔……〕雖然我是西田的徒弟之一，但希望以後能夠以無產主義者的哲學角度，從西田哲學中探究出更多新的、有意義的東西」。⁷⁴柳田的這一決

71 『柳田謙十郎——人、思想、行動』刊行委員會（編）：《柳田謙十郎——人、思想、行動》（東京：學習の友社，1983年），頁49-50。

72 柳田謙十郎：《私の人間變革》，收入《柳田謙十郎著作集》，第1卷，頁385。

73 柳田謙十郎：《私の人間變革》，頁388。

74 柳田謙十郎：〈西田哲學の學徒に告ぐ〉，收入《現代隨想全集 15：大山郁夫・末川博・柳田謙十郎集》（東京：創元社，1954年），頁345-346。

心，筆者在介紹柳田獨特思想時已多次提及。

不是僅僅只研究哲學這一哲學家所屬的學問領域，而是置身於人們因人生的悲哀不幸而產生的煩惱、在思索中展開哲學行為，這些正是對於西田哲學的實踐應用。柳田不是從唯物論的立場來批判西田哲學的內容，而是批判西田本人在缺乏與社會進行「對話」的情況下，也就是沒有以歷史、操作的方式來檢證其客觀妥當性。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柳田並不是轉向成為了唯物主義者，而是徹底地成為了西田哲學的徒弟。

借中農教篤（1924-2003）的一句話，我們可以說柳田在戰後批判式繼承的方式「將西田哲學導入大眾之中」的。⁷⁵柳田在戰後投身到勞動者的學習運動中，與勒溫所提出的「行動研究」的立場極為類似。換言之，柳田戰後的轉變，其實是將停留在觀念論階段的西田「哲學」（知）中的「行為的直觀」應用到與大眾生活（唯物論）「對話」中的實踐（行）上。

76

柳田將西田哲學「傳達到」大眾之中，這種方法論，是大眾「人生筆記」的「撰寫運動」，是與煩惱的人們進行「對話」的共同學習。「撰寫運動」是指用文字記錄下勞動者、群眾在自己生活中遭遇的煩惱，並反饋到群眾中從而達到對話效果的市民運動。本文論述了柳田將「知與行」升華到「哲學與對話」的過程。相信在柳田與臺灣的邂逅下，亦即柳田實際運用西田〈我和你〉之理論所產生的「知與行」、「哲學與對話」的意義，必能提供讀者一個能和同一時代的臺灣哲學家洪耀勳的思想進行比較的材料。⁷⁷關於柳田在戰後的影響之探討，筆者將作為今後的研究課題。◆

75 『柳田謙十郎——人、思想、行動』刊行委員會（編）：《柳田謙十郎——人、思想、行動》，引用源於結語（無頁碼）。

76 柳田謙十郎：〈哲學者の進歩〉，收入《現代隨想全集 15》，頁 396。

77 洪耀勳在〈今日に於ける哲學の問題〉（《臺灣教育》，378 號，1934 年 1 月）、〈今日に於ける哲學の問題（前承）〉（《臺灣教育》，380 號，1934 年 3 月）中一方面評價海德格的基礎存在論，另一方面援引西田〈我和你〉之理論，來做為批判海德格的理論依據。此一〈我和你〉之理論的操作，顯然和柳田有所不同。在此因篇幅關係不再展開論述。

◆ 責任編輯：郭雨穎

引用書目

近人文獻

小坂國繼 (編) KOSAKA, Kunitsugu (ed.)

2012 《柳田謙十郎集》，收入《西田幾多郎研究資料集成》，第6卷（東京：クレス出版，2012年）。

Yanagida Kenjūrō Zenshū, Nishida Kitarō Kenkyū Shiryō Shūsei Vol. 6 (Tokyo: Kuresu Shuppan, 2012).

大橋良介 OHASHI, Ryosuke

2001 《京都学派と日本海軍——新史料「大島メモ」をめぐって》（京都：PHP 研究所，2001年）。

Kyōto Gakuha to Nippon Kaigun: Shin Shiryō "Ōshima memo" o megutte (Kyoto: PHP Kenkyūjo, 2001).

田村航 TAMAMURA, Wataru

2003 〈昭和十年代の西田哲学：柳田謙十郎の教学官就任問題をめぐって〉，《学習院大学史料館紀要》，第12號（2003年3月），頁99-151。

“Shōwa jūnendai no Nishidatetsugaku: Yanagida Kenjūrō no Kyōgakukan Shūninmondai o megutte,” *Gakushūindaigaku Shiryōkan Kiyō*, No. 12 (Mar., 2003), pp. 99-151.

西田幾多郎 NISHIDA, Kitaro

1950a 〈私と汝〉，《無の自覺的限定》，收入《西田幾多郎全集》（舊版），第6卷（東京：岩波書店，1950年）。

“Watashi to Nanji,” *Mu no Jikakuteki Gentei, Nishida Kitarō Zenshū* Vol. 6 (Tokyo: Iwanami Shoten, 1950).

1950b 〈經驗科學〉，《哲學論文集 第三》，收入《西田幾多郎全集》（舊版），第9卷（東京：岩波書店，1950年），頁223-304。

“Keikenkagaku,” in *Daisan Tetsugakuronbunshu, Nishida Kitarō Zenshū* Vol. 9 (Tokyo: Iwanami Shoten, 1950), pp. 223-304.

1978 《書簡集》，收入《西田幾多郎全集》（舊版），第19卷（東京：岩波書店，1978年）。

Shokanshū, Nishida Kitarō Zenshū Vol. 19 (Tokyo: Iwanami Shoten, 1978).

安村克己 YASUMURA, Katsumi

1989 〈カッシーラー哲学とレヴィン心理学——社会学の科学基礎論に関する一考察〉，《応用社会学研究》，第31號（1989年7月），頁1-13。

“Kasshīrā Tetsugaku to Revuin Shinrigaku: Shakaigaku no Kagaku Kisoron nikansuru Ichikōsatsu,” *Ōyōshakaigaku Kenkyū*, No. 31 (July, 1989), pp. 1-13.

竹田篤司 TAKEDA, Atsushi

2001 《物語「京都学派」》（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
Monogatari “Kyōto Gakuha” (Kyoto: Chuokoron Shinsha, 2001).

柳田謙十郎 YANAGIDA, Kenjūrō

1930 〈官立精神病院設立の必要〉，《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3月27日。

“Kanri Tsuseishinbyōin Setsuritsu no Hitsuyō,” *Taiwan Nichinichi Shinpō* [Taipei], Mar. 27, 1936.

1936a 〈知と行——實存的思惟としての哲學の行為的意義について〉，《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第3輯（1936年9月），頁279-366。

“Chi to Gyō: Jitsuzonteki Shii toshitenō Tetsugaku no Kōitekiigi nitsuite,” *Taihoku Teikokudaigaku Bunseigakubu Tetsugakuka Kenkyū Nenpō*, Vol. 3 (Sep., 1936), pp. 279-366.

1936b 〈躍進臺灣と精神文化〉，《臺北帝國大學記念講演集》，第5輯（1936年12月），頁295-311。

“Yakushin Taiwan to Seishinbunka,” *Taihoku Teikokudaigaku Kinen Kōenshū*, Vol. 5 (Dec., 1936), pp. 295-311.

1939a 《日本精神と世界精神》（東京：弘文堂，1939年）。

Nihonseishin to Sekaiseishin (Tokyo: Koubundō, 1939).

1939b 《實踐哲學としての西田哲學》（東京：弘文堂，1939年）。

Jissen Tetsugaku toshitenō Nishida Tetsugaku (Tokyo: Koubundō, 1939).

1939c 《辨證法的世界の倫理》（東京：岩波書店，1939年）。

Benshouhōteki Sekai no Rinri (Tokyo: Iwanami Shoten, 1939).

1940a 《行為的世界》（東京：弘文堂，1940年）。

Kouiteki Sekai (Tokyo: Koubundō, 1940).

1940b 〈日本思想の現在及將來〉，《日本精神》，收入《世界精神史講座》，第1卷（東京：理想社，1940年）。

“Nihonshisō no Genzai oyobi Shōrai,” in *Nihon Seishin, Sekaiseishinshi Kōza* Vol. 1 (Tokyo: Risōsha, 1940).

1946 《場の哲學》，收入《西田哲學體系》，第8冊（東京：大東出版社，1946年）。

Ba no Tetsugaku, Nishida Tetsugaku Taikei Vol. 8 (Tokyo: Daito Publishing Co., Inc., 1946).

1954a 〈哲學者の進歩〉，收入《現代隨想全集 15：大山郁夫・末川博・柳田謙十郎集》（東京：創元社，1954年），頁389-398。

- “Tetsugakusya no Shinpo,” in *Gendaizuisō Zenshu 15: Oyama Ikuo · Suekawa Hiroshi · Yanagida Kenjūrōshū* (Tokyo: Sogensha, 1954), pp. 389-398.
- 1967a 《私の人間變革》，收入《柳田謙十郎著作集》，第1卷（東京：創文社，1967年）。
- Watashi no Ningen Henkaku, Yanagida Kenjūrō Chosakushū* Vol. 1 (Tokyo: Sobunsha, 1967).
- 1967b 〈わが思想の遍歴〉，《自叙伝》，收入《柳田謙十郎集》，第1卷，頁1-10。
- “Wagashisō no Henreki,” *Jijoden in Yanagida Kenjūrō Chosakushū* Vol. 1, pp. 1-10.
- 『柳田謙十郎——人、思想、行動』刊行委員會（編）
YANAGIDA Kenjūrō: Hito, Shisō, Kōdō Kankōiinkai (ed.)
- 1983 《柳田謙十郎——人、思想、行動》（東京：學習の友社，1983年）。
- Yanagida Kenjūrō: Hito, Shisō, Kōdō* (Tokyo: Gakushūnotomosh a, 1983)
- 洪耀勳 HUNG, Yaohsün
- 1934a 〈今日に於ける哲學の問題〉，《臺灣教育》，1934年1月號（1934年1月），頁68-76。
- “Konnichi niokeru Tetsugaku no Mondai,” *Taiwan Kyōiku*, No. 1, 1934 (Jan., 1934), pp. 68-76.
- 1934b 〈今日に於ける哲學の問題（前承）〉，《臺灣教育》，1934年3月號（1934年3月），頁17-23。
- “Konnichi niokeru Tetsugaku no Mondai (zenshō),” *Taiwan Kyōiku*, No. 3, 1934 (Mar., 1934), pp. 17-23.
- 1938 〈存在と真理——ヌツビッセの真理論の一攷察——〉，《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第5輯（1938年9月），頁193-337。
- “Sonzai to Shinri: Nutsuibizze no Shinriron no Ichikōsatsu,” *Taihoku Teikokudaigaku Bunseigakubu Tetsugakuka Kenkyū Nenpō*, Vol. 5 (Sep., 1938), pp. 193-337.
- 務台理作 MUTAI, Risaku
- 1934 〈ヘーゲル精神現象學と客觀的精神〉，《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哲學科研究年報》，第1輯（1934年5月），頁421-483。
- “Hēgeru Seishin Genshōgaku to Kakkanteki Seishin,” *Teikokudaigaku Bunseigakubu Tetsugakuka Kenkyū Nenpō*, Vol. 1 (May, 1934), pp. 421-483.

黒田寛一 KURODA, Kanichi

- 1968 《ヘーゲルとマルクス——技術論と史的唯物論・序説》（東京：現代思想社，1968年）。
Hēgeru to Marukusu: Gijutsuron to Shiteki Tadamonoron • Josetsu
 (Tokyo: Gendaishisōsha, 1968).

渡部清 WTABE, Kiyoshi

- 2014 〈日本哲学研究の新たな開始にむけて——「西田哲学」の独自性を検証する試みをとおして——〉，《国際哲学研究》，第3號（2014年3月），頁109-123。
 “Nihon Tetsugaku Kenkyū no Aratana Kaishi nimukete: Nishida tetsugaku no Dokujisei o Kenshōsuru Kokoromi o tōshite,” *Kokusai Tetsugaku Kenkyū*, No. 3 (Mar., 2014), pp. 109-123.

學習院大學史料館（編） GAKUSHUIN University Museum of History (ed.)

- 2002 《西田幾多郎関係資料：付全集未収録書簡》（東京：學習院大學史料館，2002年）。
Nishida Kitarō Kankei Shiryō: tsuki Zenshū Mishūroku Shokan
 (Tokyo: Gakushuin University Museum of History, 2002).

BURNES, Bernard

- 2004 “Kurt Lewin and Complexity Theories: back to the future?,” *Journal of Change Management*, Vol. 4, No. 4 (Dec., 2004), pp. 309-325.

BURNES, Bernard and COOKE, Bill

- 2012 “Kurt Lewin’s Field Theory: A Review and Re-evalu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Vol. 15 (Sep., 2012), pp. 408-425.

CASSIRER, Ernst

- 1910 *Substanz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Grundfragen der Erkenntniskritik* (Berlin: Verlag von Bruno Cassirer, 1910).
 1921 *Zur Einsteinschen Relativitätstheori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Betrachtungen* (Berlin: B. Cassirer, 1921).

ENG, Erling

- 1978 “Looking back on Kurt Lewin: From field theory to ac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4, No. 3 (1978), pp. 228-232.

LEWIN, Kurt

- 1936 *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 Fritz Heider, Grace M. Helder (trans.) (London &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6).
 1948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selected papers on group dynamics*, Gertrude W. Lewin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8).

1951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 Dorwin Cartwright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1).

MOYANAHAN, B. Gregory

2014 *Ernst Cassirer and the Critical Science of Germany, 1899-1919* (London &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4).

MARROW, Alfred

1969 *The practical theorist: The life and work of Kurt Lewin*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69).